

共生系列丛书




Symbiosi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 共生翻译学建构

刘满芸 著

 復旦大學 出版社

共生系列丛书 

Symbiosi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 共生翻译学建构

刘满芸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共生翻译学建构/刘满芸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 5  
(社会共生丛书)  
ISBN 978-7-309-11351-8

I. 共… II. 刘… III. 翻译学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68605 号

共生翻译学建构  
刘满芸 著  
责任编辑/宋启立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3.125 字数 290 千  
2015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1351-8/H · 2455  
定价: 35.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

外国人刚刚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中国人刚刚学习外语的时候亦然),天真地以为他所学到的中国词汇必有一个意义完全对等的本国词汇。当然,对于很大一部分词汇而言也确实如此,否则人类也就没有共通的人性了。但是他在学习中会逐渐发现,有很大一部分词汇在其母语中是找不到意义完全对等的词汇的。譬如汉语的常用词“天”,在英语中就找不到对应的词汇,翻译成“heaven”“nature”“sky”等并没有错误,但只是翻译了“天”的一部分意义;当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这个“天”用“nature”“sky”等词汇来翻译肯定犯错,而用“heaven”“god”来翻译似乎倒有合理之处。这可能令西方人非常诧异,因为按照西方传统,上帝高于人,人高于自然,上帝是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人的,并且将自然交给人管理与支配。而在中国传统中,天高于人,皇帝也不过是“天子”,“天”有时候确实具有主宰意义,譬如古语中经常出现的“天怒而降灾于人;但另一方面又具有自然意义,当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当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当庄子借北海若之口说“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的时候,这个“天”几乎等同于自然。而对于一大批能够表现中国文化底蕴的概念(如“仁”“气”“风骨”“神韵”等),其

翻译的难度“与天齐”，甚至还大于“天”。

传统的忠实翻译之说正如外国人刚刚开始学习汉语之时或中国人刚刚学习外语之时，以为一种语言中产生的词汇必定会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至少是能够阐释出来。但是，当遇到跨文化的语言翻译的时候，传统的忠实翻译之说往往就会显得尴尬：原来这个文化产生的词汇在另一个文化中压根就找不到对应的词汇，甚至这个文化产生的文体在另一个文化中根本就没有（如在中西对话中中国的赋与西方的史诗）。事实上，对传统的忠实翻译之说的冲击还来自“上帝死了”之后主观主义的泛滥，从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到读者反应批评，从罗兰·巴特的“作者死了”到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在此之后的翻译理论主观主义色彩越来越严重。正如读者反应批评以为文本的客观性只是一个幻想而放纵解释的随意性一样，当代的翻译理论在冲击传统的忠实翻译之说以后，也走向了这同一个方向。

面对着如此纷纭复杂的翻译理论，刘满芸教授的《共生翻译学建构》试图从共生翻译学的角度，进行梳理、廓清与重新估价。一方面，本书以共生翻译学的理论建构，几乎对当代所有重大的翻译理论都做出了理论回应，甚至包括深奥的本雅明的翻译理论；另一方面，她又以共生翻译学的理论视野，对翻译史进行了反思。就我上述提到的问题，本书对传统的忠实翻译之说给予充分的理性解读，即使在遭遇到跨文化与主观主义的翻译理论冲击之后，她仍坚持要实现文化传递的任务，完成盗火的普罗米修斯的使命，并从共生翻译学的角度，认为“翻译意味着在两种语言与文化的生态场中同质互助、异质共存”。

刘满芸教授在几年前读研究生的时候听过我多门课，然而不得不说的是，她现在的理论勇气完全超过了我。记得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 20 多岁的时候,有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理论勇气,参加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提交的论文就是《论中西比较文学》,然而后来这种理论勇气逐日被消磨。到刘满芸教授学位论文开题的时候,我同意了其他老师关于其论题太大的意见,觉得学位论文还是小一点,别人找毛病也难;但我又生怕挫伤她的理论勇气,说“共生翻译学”这个大题目在学位论文之后,可以继续做而不要放弃。没有想到,几年之后,她真的将这个大题目做出来了,而且比我想象的做得要好!希望刘满芸教授以此为起点,取得更大的理论成绩。

高旭东

2015 年 1 月 1 日于人大天问斋

## 自序

自从地球上出现了人类,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便开始了。我们不清楚人类的先祖在各自狭小的语族内自闭了多么漫长的岁月才冲破地域与空间的阻隔,实现了跨语族交往的愿望;而人类这种跨语言疆界的交流与互动一定是通过翻译才得以实现的,这期间必定充满了神奇、勇敢、艰辛而心动的体验。可以说,人类是趟过族群间神秘语言的河流,才到达了文明、共生的彼岸。

人类族群间的互联与共生在很大程度上系于语言这一沟通纽带,也就是说,翻译承载着人类共生的使命。翻译所展示给人类的,是奇异曼妙的世界,是异彩纷呈的民族,是珍奇各异的习俗,是鲜亮别致的文化,是争奇斗艳的服饰,是千奇百怪的禁忌,是光怪陆离的景观,是费人思量的审美,等等。某种程度上说,翻译是一种使命性行为,它要完成的使命是架通人类语言与文化的桥梁,消除族群间外在与内在世界的隔阂。人类漫长的翻译足迹见证了人类各族群间文明进化与共生的历程。可以说,人类的翻译史就是见证人类文明冲突与交融的历史。在人类文明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生态场中,各民族充当了文化与文明互动的主体,并使之生发与延续,多元而繁茂。翻译是人类文明的共生纽带,它像一根文明之线,把人类世界维系在一个整体的共生网络当中。可以说,翻译是

人类文明的火种,译者是盗取人类文明火种的“普罗米修斯”。

### I. 共生: 翻译研究新视界

“共生”(symbiosis)是生物学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基本概念,它缘起于1879年生物学界的一个首创术语,由德国真菌学奠基人德贝里(Anton de Bary, 1831—1888)提出,指不同生物之间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130多年来,自然界生物共生现象的实证已经被人们普遍认识和接受,生物间的共生法则中所蕴涵着的理性光芒很快冲破了自然科学的疆界,迅速辐射到生物学、医学、农学、气象学、生命科学、系统生态学等自然科学之外的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教育学、心理学、美学等众多人文学科领域。生物共生法则体现了宇宙中生命存在的本质性普遍特征,共生理性具有广泛的普世意义,因而具有强大的跨学科特性。可以预见,随着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人类的共生生态会进一步繁华,共生层面会进一步激活,共生空间会进一步扩展,共生领域会进一步广延,各种共生关系会更加紧密。

人类共生以语言为基础,以翻译为纽带,以思维共性的普遍性为生物与心理机制。人类繁华的族群语言与文化是事实上的互为共生关系,而没有翻译就没有人类语言与文化的互为共生,翻译是人类语言与文化之间发生共生关系的前提,并为语言与文化发生多元共生关系提供了无限的生存与延展空间。共生翻译学以生物共生的自然法则为伦理依据,通过探究人类语言与文化交互作用过程中的共生机制与效应,了解其在本质上的共生特性;通过探索语言文化多元生态及其内在关联、互为作用的特点,剖析其内在发展变化的动因与规律,以便人们认识并能动地适应这些发展与变化规律。

共生翻译学主要借鉴了生物共生学关于生命共生的自然科学



观点,以一般系统论、社会共生论、协同学、生态翻译学、文化共生学、共生教育学等广联视角为辅助,探索语言与文化的内在共生规律。共生翻译学从共生的哲学意义出发,认为无论是共生、系统、协同,甚至是生态,这些概念的本质都是物质与物质、组分与组分(要素与要素)、成员与成员之间的“秩序”关系,因此主张翻译的整体共生、动态共生和相对共生。一切翻译行为与翻译观念皆处于相对性与动态性的变化之中,既不可能茕茕孑立,也不可能亘古不变。整体指普遍,动态指变化,相对指平衡。

千古难事之翻译,之所以难,主要出于两个原因:

一是翻译的对象涵盖甚广,世间之物,无所不及。从广域上说,翻译可以涵盖世间一切,因为世间的一切都可以成为翻译的对象;而语言是人类文明的基石,宇宙间的一切都可以用语言来描述,人类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可以通过语言记录下来。那么,要用五花八门的民族语言来描述大千世界,来记录思维过程,来评论思想观点,就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个性与特点;若要把所有这一切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就更加不能统一了,毕竟,你、我、他或她,看世界的角度不会毫无二致,不管是描述、规定、模拟、诠释/阐释,还是再创作,翻译的多样化在所难免。

二是人类对翻译的认识始终处于一个“弃旧迎新”的过程,每个时代都会产生一些新的观点、新的主张。翻译有史以来,人们关于翻译的定义、方法、理论、流派等千姿百态、见仁见智。什么是翻译,翻译是什么,为谁翻译,怎样翻译,观察与理解的层面与视角向来不一。从个人的视角看翻译,自然是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从组织或群体看翻译,翻译有可能被解读成恰恰相反甚至对立的東西。角度决定观点,思维路径不同,结果就可能相左;但毫无疑问,正是这些五花八门、多姿多彩的翻译“见解”构成了共生

翻译观实实在在的内涵。然而,或许是翻译理论家或研究者给翻译设定了太多的章规与枷锁,才使得翻译成了“裹着镣铐”的劳作。众多的理论与思潮使得译者颇为花眼,渐失自信。其实,如果一种理论不能解释或产生好的翻译,那就无须遵从。要解决翻译中的繁杂问题,实现理想的翻译,只有冲破众说纷纭的理论枷锁,开辟新的、更广阔的思维视野,探索更切近时代和实际的翻译理论与方法。

我对共生翻译学的认知,涉及生物学、哲学、社会学、系统学、协同学、生态学、经济学、文化性、教育学、心理学、美学等学科层面,对生物共生法则的跨学科特质与生命共性很是着迷,为生物共生规律中所蕴含的哲学自然观与天然理性光芒所折服、感叹!心想,生物共生法则不就是为了世界有一个“统一的宇宙观”信念而自然生成的一个普世标杆吗?我很快就从哈肯的《协同学》当中感受到了这种思想的一致性。当我读到生物共生理念已经在以上提到的众多学科中产生强大回响时,我联想到了自己长期从事的专业研究与教学工作——翻译。心想,做一些学科交叉性研究,对翻译学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指导也许会产生些许哲学层面的意义,于是便有了成书的冲动。

我从胡守钧教授的《社会共生论》中获得了关于“共生”的认知,我的共生翻译学中的一些基本理论思考路径都得益于这部书。另外,中国知网、百度、维基百科、谷歌等庞大的学术与知识资源共享平台的创建,大大缩小了前沿学术与地方学术在信息和资源占有方面的落差,这样一些迅捷便利、省时省力的博大学术资源宝库本身就是各种思想与观念共生的生态场,彼此间的碰撞更成为新思想、新观念的摇篮。这尤其是中国地方知识分子的福音。

## II. 共生翻译学建构

共生翻译学从翻译的基本共生原理、共生关系及共生要素等层面进行系统性剖析,透视翻译与社会构成的复杂交错的共生关系。共生翻译学既是一种分析翻译的理性哲学工具,也是探索人类语言文化共同发展及演变规律的路径与方法。共生翻译学可以看作一种探索翻译如何存在又如何指导翻译的科学,它着眼于研究翻译如何在人类社会中存在与发展,又如何促进人类语言与文化间的共生和共荣。

翻译作为一门学科,更是作为社会共生的一个单元、一个领域或一个子系统,是一种客观存在。翻译学科的内部、翻译与其他学科之间、与整个社会发展结构和环境都构成了真实的共生关系。因此,以共生为视点研究翻译,研究翻译学的内部要素之间、翻译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翻译学与宏观社会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和共生状态,是一种客观需要。

共生翻译学以研究翻译共生现象、性质及规律为基点,从翻译与人的共生、翻译与语言、文化及社会的共生关系出发,审视翻译共生的环境、翻译共生的机制以及翻译共生的社会机理等问题。翻译的共生关系是人类语言与文化进化和发展的基本方式,翻译中的各种共生关系如何演化,怎样优化各种翻译共生关系,是共生翻译学研究的基本内容。

翻译中的各种共生关系是翻译存在的基本前提。试想,人类若没有语言的共生现象,哪来的翻译?人类若没有文化的共生现象,何谈翻译中的文化共生?人类若没有人际的交往,何谈人际间的共生?所以,研究共生翻译,就是要研究翻译中的人间万象,观察翻译中的各种共生样式、特征、性质和规律,剖析翻译中各种问题、冲突、矛盾之成因,透视翻译的内在机理与结构等问题。总之,

要研究翻译中各种共生关系的存在现象、性质、方式及规律,首先要研究翻译中各种共生矛盾与共生现象。

研究翻译的共生关系应像研究社会共生关系一样,最基本的准则是,要将翻译共生现象当成客观事物对象,当作社会本身具有的现象与本质。翻译研究者应摆脱对翻译共生现象的主观意识,而把翻译共生现象当作一种客观存在来研究,用翻译事实来解释翻译共生现象,分析翻译共生现象的本质、特征、方式和规律,进而逐步建立共生理念的翻译学。

共生理论的学科渗透非常广泛,对“共生”的人文解释也是多元的。共生理论与本书的研究目标对象——共生翻译学——在很大程度上有同构度,但需要笔者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去对待。共生翻译学的核心内涵是共生,就笔者的理解而言,共生翻译与翻译共生二者的侧重是不同的。共生翻译很大程度上是指翻译的伦理、目标、理念与规范,是人类关于翻译的总的愿望和念想,宏观层面指向多,是一种关于翻译的总的指导方针与行为准则。共生翻译的实质是指人类语言与文化的协同进化与发展,对翻译的共生现象、性质、规律及原理等方面进行研究,是共生翻译学研究的主要任务。研究共生翻译,其实就是研究翻译诸多共生关系的存在及演化规律。随着社会综合环境的变化,翻译中的共生关系会变化,由不合理到合理,再由合理到不合理,如此反复,以至无穷。翻译的秩序就是通过翻译中诸多关系的自身或相互作用,或妥协或斗争,以达到各种共生关系的平衡与和谐;而这种和谐与平衡又会随社会综合环境的变化而打破,形成新的不平衡。共生是维持翻译诸多关系平衡的最基本因素,竞争也是维持翻译诸多关系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协同合作是翻译主体之间的生存本能与必需,没有诸多关系之间的协作,便无所谓翻译环境,也无所谓社会群体,

更无所谓民族与文化间共生和共融；另一方面，竞争在翻译主体之间不可避免，这源于知识背景、价值信仰、资源分配、个性禀赋等差异，也源于翻译主体之间的不均衡发展。竞争是社会优先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竞争，便没有创新与剧变；没有竞争，对秩序的威胁便少了很多。追求进步与优先发展是竞争关系的有力推手。共生是翻译中诸多关系的存在与发展机制，译本与原文本互为共生，没有原文本，译本也无法存在；而没有译本，原文本中的语言和文化生命就无法在译语社会与文化中得到延续，原文本中的文化生态空间就无法延展。翻译是一种存在，是族群间语言与文化互联共生的存在；而描述这种存在，分析存在于翻译中的各种共生现象，规避翻译诸多共生现象中的负面与不利因素，进而优化翻译共生环境，是共生翻译学的意义所在。翻译需要发展和进化，一个好的翻译共生环境，能推动语言、文化、人际、社会等诸多翻译生态的和谐共生，而这正是从事翻译的个人、集体、机构或组织应当为之努力的。

与共生翻译相比，翻译共生则指翻译的异质多元、相生相容的景观和形态，微观层面指向多。翻译共生既指主体层面，也指客体层面，还指伦理规约层面；既涵盖语言文化间的互生与共荣，也涵盖语言文化间的差异与冲突；既有译技方法的含义，也有态度策略的意指；既有伦理层面的约束，也有实践层面的检验。翻译共生是翻译主体在双语社会、语言、文化系统中分享资源、相互渗透、自由创造并传播文化精神的依存关系，任何社会文明形态都依赖翻译这个庞大的语言文化生态场而获得生机，都为自身语言、文化、人际、社会的进化与发展输入了活的泉流。有翻译的地方，语言与文化就不会消亡，越是固守自己的东西，就越会增加自身消亡的危险，因为固守违逆了事物共生的生存逻辑和法则。翻译之于一个

民族的意义在于它是这个民族从野蛮与自闭走向文明与繁盛的“始基”。

翻译的最终目标指向是族群语言与文化的共通和共荣，而不是相反。依照共生学原理，多元的语言文化生态能促发每一种语言文化成长的张力，就像树孤而枯、草孤而亡一样。任何企图以自身强势文化销匿其他弱势文化的“图景”，最终面对的只能是一幅毫无生机的枯萎画卷。人类进入 21 世纪的实践证明，国际平台多语种信息交互使用的局面稳固而繁荣，多元并存的文化生态潮流不可逆转。这是因为，知识化、信息化、网络化的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单一的文化都不可能在多元文化需求的生态中获得主导性空间，至多也只能是在“一定张力下”的相对主导，人类对文化多元性的刚性需求不可能被人为地遏制。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争夺的欲望逐渐归于理性，尽管不乏间断的、局部的、帮派的冲突与挑逗，但多元文化的共生性诉求掣肘着文化间此起彼伏的膨胀欲望，毕竟，和谐共生才是人类语言文化生态的根本价值向度。面对全球化、国际化、网络化、信息化的多元合作平台，弱势民族文化应积极创建语言文化共生环境，拓展自身发展空间，跳出自身狭隘的文化圈地，跨越文化的“卡夫丁峡谷”(Kafdin Valley)。只有如此，族群文化的多元共生形态才能得以存续、延展与繁茂。

从共生视角看，原作与译作之间是一种既排斥又互补的共生关系。比如，原作者与译者之间既有排斥性又有互补性；排斥源于文化个性，宗教信仰、人生价值、语言风格、个性禀赋等各种各样的差异；互补也源于同样这些差异，源于人们对异质、陌生、新奇等渴望了解与认知的愿望。共生与竞争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从属关系，竞争是共生的重要内涵。共生是自然、人类、社会的普遍性，而竞争则是自然、人类、社会的特殊性。换句话说，共生是自然与人类社会中的

的一种均衡状态,是一种常态;而竞争则是自然与人类社会中的一种不均衡状态,是一种非常态的现状。比如,经济发展、资源过度开发与生态破坏之间的失衡关系,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失衡关系,人际间的冲突与疏离等失衡关系,如果这些失衡关系不妥协、不斗争、不改变,那么,各种失衡的关系就不会重新回到均衡。所以,无论个体还是集体都要认识到冲突、异质是共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事物发展的前提。但冲突不是目的,共识才是大局。共生是向同质和异质双向开放的多元共生的集合体。共生绝不意味着同质,反而更大程度上意味着异质。共生意味着同质互助、异质互补。

共生翻译的诉求不是追求同质化,导致语言与文化的单一化、标准化,进而走向衰竭;而是追求异质化、多样化,从而使语言和文化走向包容与强大。共生翻译是一种积极创造翻译和谐环境,建立翻译主体间性与客体多元共生生态,传达不同声音,互为认知、宽容质疑、相互吸纳、协同进化的一个沟通与反馈的良性循环过程。这对整个人类翻译事业而言不失为一种理性选择,对译者个人又何尝不是一样的呢?译者在个人一生中要经历很多社会变迁,思想与观念会不断变化,个人学识与专业素养会不断提升,这些都会在他/她的翻译研究与实践中留下烙印。也就是说,译者一生的翻译目的、翻译策略与方法、对翻译的认识以及对自身翻译的要求都是动态的、前行的,不可能死守陈规、寸步不前。译者的翻译策略与方法总是在不同的选择中穿行,“偶尔进行复制或模仿,幸运时创造,有时解码与重新编码,时常进行交流,也许还有少量的操纵(但希望‘从不食人’)”<sup>①</sup>。

---

<sup>①</sup> Chesterman, Andrew; Wagner, Emma. “Can Theory Help Translators?”, 穆雷、李文静译:《理论对译者有用吗?——象牙塔与工作面之间的对话》,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ix页。

对共生翻译的度的把握体现在伦理与规约层面。共生翻译的前提是译者准确地把握原作者意图,努力再现原文本的艺术风格,对原文本的偏离仅限于目的语读者能够理解译文的界限,而不应故意揣测、贴合读者的阅读愿望。翻译的目的是服务于读者,但怎样服务读者,服务读者什么,却是一个道义上的问题。为了经济利益或销售排行榜上的虚荣,引诱读者猎奇、猎艳、猎怪,甚至暴力变态的、与社会群体和谐共生格格不入的变质翻译并不鲜见。翻译共生不是翻译乱象丛生,而是追求人类语言与文化的共生,人类思想与智慧的共生。一切本着理性、客观、科学的态度去探索翻译诸多共生现象及本质规律的研究都值得尊重;而畸形的翻译共生纽带,如权钱关系、名利关系、奴役与被奴役关系、权力主人与文化仆人的关系等,都会导致畸形的翻译共生关系。

原文与译文本是同根共生关系,然而,后现代解构思潮盛行以来,各种嘈杂声频频出现。在“译者主体性”极度张扬之后,翻译成了“无限意义的生成”活动,译者成了“决定性的权威”,译本成了“比原文更能接近作者意图的东西”,等等;自罗兰·巴尔特在其著作《作者之死》(1968)中宣告了作者权威的终结以来,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解构主义带来的后果有目共睹:主体狂热与过度阐释。其结果就是文化自恋与文化自大极度张扬,语族间的语言文化生态激烈碰撞,语言与文化帝国主义无孔不入;与此同时,边缘语言与文化却急速削弱,甚至消亡。中国语言文字网于2012年2月27日上传了一篇题为《全球语言近半数面临消亡》的报道,相关数据着实令人痛心与震撼。报道说,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估计,人类现存的6000多种语言中有近半数正面临消亡,平均每两周就有一种语言消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发布了一幅受威胁语言的地域分布地图,目前在上面列出了2474种语言的名称、濒危程度和使



用地区,其中有 230 种语言自 1950 年起已经消失。语言消亡有许多原因,如战争、民族驱离、人口迁移、语言霸权等;而互联网、多媒体则为英语成为事实上的世界通用语(*lingua franca*)提供了优先条件。面对这样一个语言生态危机,翻译该是什么,译者该译什么,文本该呈现什么,读者该期待什么,理论家该质疑什么,难道还不清楚吗?

人类语言在繁华共生的同时也面临着衰亡的危机,尤其应关注口头言语、方言的生存状态。翻译共生很大程度上讲的是语言共生,而口头语言是扩充书面语言的一个活的源泉,因为口头语言源于小群体的劳动生活,源于民间创造,源于长期累积与打磨,形成从小群体口头相传(方言、方音),再到区域性口传流通,最后融入书面语中。民俗学家冯骥才最近通过网络叹惜:仅近 10 年中,我国消失的自然村庄达 90 万个,这是一个相当恐怖的数字,这 90 万个村庄的方言与方音的生命力及其命运可想而知。试想,如果一个群体甚至一个种群已经丧失自身的语言所属特征——方言或方音,那她已经名存实亡。令人扼腕的是,作为文化的前沿形态与“声”态,口头方言的多样化不断枯竭,人类祖祖辈辈不断创造、积累、提炼才形成的小规模、区域性的方言群竟如此急速地消失,这不能不说是人类语言文化在某种意义上的死亡。

爱因斯坦认为,“相信世界在本质上是有秩序的和可认识的这一信念,是一切科学工作的基础……在一切比较高级的科学的工作背后,必定有一种关于世界的合理性或者可理解性的信念,这有点像宗教感情”<sup>①</sup>。这种科学信念“给人一种研究的基本假设,并

---

<sup>①</sup> 《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许良英、李保恒、赵中立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页。